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制、实践效能与路径研究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贫困地区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顺利实现脱贫，教育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保障，职业教育扶贫是我国教育扶贫领域的重要环节，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途径。文章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为核心，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出发，剖析了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意义，表现在精准扶贫途径上就是，职业教育可以帮助贫困个体实现直接性、发展性和补偿性扶贫，使他们获得经济性、符号性以及缄默性资本收益。阐述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效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扶贫目标的一致性、职业教育的服务主体与扶贫的对象具有吻合性、职业教育对扶贫事业的贡献具有直接性和长效性、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之间存在着共生性。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发展进程良好，但是也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问题，进而提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路径——“革新观念，消除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精准帮扶，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完善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性；创新主体，强化多方协同效应。”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路径，从而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制；实践效能；路径研究

一、问题提出

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历史性问题，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消除贫困一直是各国政府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党和国家一直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扶贫工作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4年，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贫穷” 的伟大论断[1]。1986年始，国家正式启动了大规模帮贫扶贫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精准扶贫新思想，自此，中国扶贫事业迈入了精准扶贫的新时代。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扶贫工作的时候，进一步就精准扶贫理念提出了细化的要求，明确了精准扶贫需要做到“六个精准”，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到2020年贫困人口必须全部脱贫”的目标。十九大将扶贫工作视为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智办教育”，长期的扶贫实践经验表明，消除贫困的根本点不在于外源的物质捐赠，而在于切实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力以及脱贫致富的能力，即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2]，尽管不同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各不相同，但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极为明显的，由此，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让贫困人口的下一代接受教育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职业教育扶贫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普惠性教育和跨界性教育，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为直接、精准、长效的途径[2]。

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总则中明确提出：国家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3]，积极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都把消除贫困作为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之一。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治贫先治愚，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强有专业特色并适应市场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中，职业教育都是精准扶贫的核心战略之一。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与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高度契合。

然而，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滞后、吸引力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职业教育如何实现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基于这样的反思，文章从职业教育个体收益的视角出发，充分分析和思考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实践效能，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路径。

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

职业教育以关注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其它类型的教育相比，更具有社会性和开放性，是一种针对面十分广泛的“平民教育”[4]，在国家资助政策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具有门槛低、成本低的特征，能够精准聚焦到贫困群体与底层社会[5]，成为贫困群体和社会底层百姓的最佳选择；同时，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从专业匹配度与就业选择这一层面来看，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更能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契合区域对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精准扶贫。

（一）精准聚焦扶贫对象：从“县域”到“个人”

从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史来看，扶贫工作总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86－1993年的“大规模扶贫”阶段、1994－2000年的“攻坚扶贫”阶段[6]、2001—2012年的“整村推进扶贫”阶段。在过去30多年的扶贫史上，扶贫对象经历了“大片区—贫困县—贫困村”的变化，到了2013年起，“精准扶贫”又把扶贫对象精确到户，至此，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贫困县、贫困村与贫困户的三级扶贫瞄准机制[5]（如图1）。



图1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对象聚焦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则可以通过政府调控与家庭选择精准聚焦到贫困户中的贫困个人，建立从“县域”、“村域”到“个人”的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如图1），由图1可见，在这一机制中，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直接架起了从“县域”扶贫到“村域”扶贫再到“个人”扶贫的桥梁。

在宏观层面上，职业教育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助推县域、村域的扶贫，由此也就有效地覆盖到了贫困县、贫困村两个层面的扶贫工作进程；在微观层面，在国家资助政策推动下，职业教育由于受教育成本低廉，逐渐成为贫困家庭的首选，家庭通过自主选择购买教育机会和政府对培训机会调控而聚焦到贫困家庭和贫困个体[5]。

职业教育是相对廉价的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家长和学生会自主选择职业教育。研究显示，高职院校毕业生大多数来自贫困地区、西部地区与民族地区；在中职学校，这一比例更加明显，其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且其父母多为农民、工人；同时，政府也会有意识将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下岗工人培训等机会和资源向贫困家庭以及贫困个人倾斜。通过以上途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就能最大限度地聚焦到贫困户与贫困个人等特定的对象。

（二）拓宽扶贫渠道收益：从“输血”到“造血”[7]

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素质型贫困、机制型贫困和条件型贫困，外在特征表现为经济条件落后、经济能力匮乏。因此，解决贫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财政拨款、资金援助等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输血”，通过增加经济援助、加大财政拨款力度改善贫困户或者贫困个人的经济条件，但是解决贫困最根本的办法还是“造血”，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积累社会资本，全面提高个人经济能力和社会竞争力，进而达到改善贫困个体经济状况的目的。

职业教育是目前最有效的精准扶贫方式之一，通过技能教育与培训，一方面能通过增加个人的经济性资本收益实施“输血”扶贫，另一方面又能增加个人的符号性资本收益与缄默性收益实现“造血”扶贫[5]（见图2）。如图2所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三种途径：



图2 个人收益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路径

第一种途径是直接性扶贫，贫困个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直接促进了个人经济收益的有效增加，初步实现“输血”扶贫的成效；

第二种途径则是发展性扶贫，贫困个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进一步获得符号性资本收益（符号性资本收益主要是代表社会资本的“符号”带来的好外，如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学位证、学分收益等的“羊皮效应”。）[5]；

第三种途径是补偿性扶贫，职业教育通过促进个人缄默性收益（缄默性收益是指无法直观衡量的各种收益，如机会补偿、避免犯罪的收益和健康收益等。）持续增值。

上述三种类型的收益，对于贫困个体来说，都是可以实现长期增值的。图2所展示的三种途径，个人收益都是相互关联的，意味着在更深层次上，不管是发展性扶贫还是补偿性扶贫，最终都需要实现收益的转化，即全部转化为经济性资本收益，这样才能更直观地改善贫困个体的经济能力与经济条件，进而摆脱贫困。

（三）个人收益的分析框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过程

从精准聚焦扶贫对象到拓宽扶贫渠道收益，再到实现精准脱贫目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基于个人收益的分析框架，可以构建起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从贫困个体选定到帮助贫困个体实现脱贫的过程模型[5]（如图3）。



图3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过程

首先，出于成本考虑，贫困家庭会自主选择购买教育机会，优先考虑职业教育，同时，地方政府根据扶贫政策和客观实际，会对职业教育培训进行宏观调控，将职业教育资源优先向贫困家庭倾斜，贫困个体因此成为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个体通过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或技能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的个人技术与文化水平等，达到个人经济性资本收益的目的，实现直接性扶贫；

其次，贫困个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个人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质，进一步获得符号性资本收益，通过符号性资本性收益的增加，针对贫困个体的直接性扶贫也得以完成，并且也实现了发展性扶贫；通过缄默性资本收益的增加，进而实现补偿性扶贫；

最后，基于直接性扶贫、发展性扶贫和补偿性扶贫[8]，贫困个体的个人收益得以增加，进而实现个人脱贫，个人实现脱贫后，可以带动家庭实现脱贫目标，由点到面，实现“扶贫一人，脱贫一户”，继而带动贫困村脱贫，最后实现县域脱贫，从而带动整个区域实现脱贫。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效能

(一)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扶贫目标的一致性

从教育的目标来看，职业教育侧重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和文化水平的生产和管理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9]，更加强调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其操作性强且更加符合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更适合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又急需获得工作岗位、提升收入水平的人群[10]。由于以实战教学为导向，所以贫困个体的学习成本往往很低，而且见效快，因而，也最易就业，可以快速解决就业和待业等问题，接受职业教育的民众往往能够更快地融入到工作中，投入到生产和经营一线并创造“生产力”，在就职初期就可以获得较高收入。这一点和农村贫困人口急于脱贫，希望能够通过技能训练或者教育培训尽快找到工作，获得经济性收益的心理比较吻合。

国内一些学者对我国不同时期扶贫治理工作实践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难度不断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贫困人群中致贫的主要因素“因学致贫”和“技术与劳动力短缺”所占比重偏高。

作为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和文化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可以显著提升贫困人口的技术素养，使贫困人口获得就业能力和工作机遇，其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扶贫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职业教育的服务主体与扶贫的对象具有吻合性

职业教育从整体上属于易学易懂、便于上手、办学层次较低的技能型非学历教育或者学历教育模式，涵盖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与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对象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职业教育对象涉及的层次多、范围广，且多为贫困家庭子女，其教育对象具有“普及性”和“人民性”，尤其关注弱势群体自我能力的提升，同时其教育内容又具有“效用性”和“技能性”，各层次的教育对象都可以接受，对于尚未脱贫的贫困人口而言，如果能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获得技术技能，无疑会增加他们脱贫的本领，这种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对象指向的精准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职业教育扶贫的效能。

 根据职业教育作用的主体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来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经济收益时效性较强的贫困人口，可以采取非学历型的职业技能培训，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掌握简单的致富技能，并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 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掌握一定技能的贫困人口可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采取中、高等学历型教育方式，逐步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水平，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三) 职业教育对扶贫事业的贡献具有直接性和长效性

相较于“输血”式的物质扶贫，职业教育更倾向于“造血”式的智力扶贫[11]，它能够赋予贫困人口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不仅有利于贫困人口迅速地走出“贫困陷阱”，而且，贫困人口返贫的可能性较小，促使他们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走的更稳更远，具有扶贫效果治本性与持续性的特点。

各地的实践表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贫困户家庭成员或者贫困个人掌握一技之长，可使其快速实现“一技在手，终身受益”的目标，尤其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那些接受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在劳务输出以后，相对于没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往往会获得更高的工资。相关研究考察了各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12](见表1) 发现，除了生产性固定资产、户主受培训的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达到了13.28%，户主受教育的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达到了8.3%，户主受培训与教育这两项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这两项合计对户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达到了21.58%。基于此，对于低收入农民工群体而言，在积累生产性固定资产之外，还需要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表1 各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  |  |  |
| --- | --- | --- |
| 各变量 | 基尼系数 | 贡献率/% |
| 家庭规模 | -0.001 | -0.41 |
| 户主年龄 | -0.002 | -0.83 |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020 | 8.30 |
| 户主受培训程度 | 0.032 | 13.28 |
| 生产性自查原值 | 0.161 | 66.80 |
| 耕地面积 | 0.016 | 6.64 |
| 税费支出 | 0.003 | 1.24 |
| 劳动力比重 | 0.008 | 3.32 |
| 外出劳动力比重 | 0.004 | 1.66 |
| 所有X | 0.241 | 100.00 |

注：这里的收入是指拟合收入扣除常数项后的收入项。

除此之外，职业教育及其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加快精准脱贫速度，增加贫困个体的收入水平，提高贫困个体的就业竞争能力，而且能够更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得到了有效地提高，有助于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和积累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思维观念，使他们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增强自主性，产生更强烈的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就业、创业的动力也会大大增强，这些都有利于激发贫困人口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内生动力，最终从根本上阻断贫困。

因此，职业教育对于精准扶贫工作的贡献作用更加具有直接性和长效性，特别是对贫困地区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可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四）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之间存在着共生性

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工作有着密切的利益共生关系。一方面，通过推动职业教育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扶贫的优势，促进职业教育转型发展，还可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2]。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与民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职业教育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办学机制、教育培训等方面更具有灵活性，它能够将资金、技术、政策等多种生产要素融合一体，充分发挥产、学、研等方面的优势，突出产、学、研等方面融合的合力，并围绕这些合力来建立市场、资源、政策等扶贫长效机制，为社会贫困群体提供人力资本的支撑，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

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可以提升职业教育的发展内涵，职业院校通过精准扶贫工作可以检视自身服务社会功能的不足[13]，进而增强自身人力资源开发的优势和效能。职业教育的职能不仅仅是扶贫工作，而是要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来为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资源分配机制下，职业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生源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如何更好地实现对贫困地区人口的职业教育和技能训练，促使他们顺利脱贫，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各个参与主体的合力，不断改革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拓展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

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路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国家在扶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为人类的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脱贫攻坚事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职业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战略的基本手段和战略重心，因其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地位而备受关注，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均将职业教育扶贫作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要素。然而，尽管职业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战略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现实中我国职业教育扶贫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要求还存在不少的差距，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依然滞后，各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力度，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事业中的效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扶贫治理体系，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革新观念：消除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在党和政府的关注推动下，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办学模式也不断创新，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4]，职业教育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然而，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思维习惯的影响，职业教育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重“道”轻“技”的社会文化观念依然普遍存在，鄙薄技艺的社会价值理念和“学而优则仕”的固化观念并没得到根本性改变[15]，职业教育的社会贡献与社会认可度矛盾问题依旧十分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

为了有效推进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扫除这种无形的障碍[14]，必须要从革新观念开始，积极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扶贫氛围，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努力：

第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加强对社会大众尤其是贫困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观念引导，在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等方面肯定职业教育的劳动价值，扭转社会大众尤其是贫困人口鄙薄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和偏见，积极营造技能宝贵、崇尚技能的社会文化氛围，形成职业教育光荣、创造伟大的文化观念，积极引导贫困人口转变教育观、人才观，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流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宣传工具，加大对职业教育在扶贫、减贫工作中宣传力度，充分展示职业教育在扶贫、减贫工作过程中的优势，促进各种社会团体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了解，使其在观念上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扶贫、减贫工作的重要性，形成积极的职业教育扶贫文化氛围和社会舆论环境，进而在行动上参与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中来。

只有达成这样的共识，才能使职业教育在扶贫领域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从而提升贫困群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精准帮扶：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

近些年来，我国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招生规模、办学条件、资助力度和师资力量仍然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各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难以有效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为了促进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首先，在现行的招生制度下，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的倾斜力度，在发挥职业院校招生政策的灵活性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对贫困地区的招生规模。扩大职业院校面向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定向招生、单独招生政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定向招生、单独招生的规模和比例[2]，从而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更为充足的人才储备。

其次，积极开展东部对西部、城市对贫困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工作。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继续推动东部对西部、城市对贫困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工作，通过互派专业教师、合作开发课程以及共享教学资源等方式[10]，培养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的专业教学人才，提高贫困地区职业院校的教学与管理水平；东部地区的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也要积极支持贫困地区职业院校的建设，定期派遣重点专业的教师或者重要岗位的管理人员到贫困地区挂职锻炼，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派遣教师或者行政管理人员到东部地区学习，通过“双岗置换”的方式，培养专业化的精准扶贫业务人才，通过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增强贫困地区职业院校的“造血”功能。

最后，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持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精准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满足精准扶贫的需要；在“精准资助”方面，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强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经费的统筹力度，可以通过助学贷款等方式建立职业教育入学的“绿色通道”，积极拓展贫困地区家庭子女接受免费职业教育的覆盖面，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资助力度，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引导社会机构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对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资金补助，保护其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积极性，从而有效避免农村及偏远贫困地区家庭子女出现“因学致贫、因教致贫”的现象。

（三）完善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性

职业教育的办学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4%BA%BA%E6%95%99%E8%82%B2%22%20%5Ct%20%22https%3A//baike.baidu.com/item/%E8%81%8C%E4%B8%9A%E6%95%99%E8%82%B2/_blank)相比较，职业教育更加侧重于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该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精准性，提升贫困人员自身的脱贫能力。基于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

首先，要逐步构建“个性化”、“全人化”和“平民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面向人人”的目标，尤其是对贫困群体的广度聚焦。职业院校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实践技能、社会服务、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优势，以贫困人口为服务对象，针对贫困人口开展针对性的技术、技能培训，如可以将职业教育对贫困人口技术培训和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技能培训等结合起来，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进而提升精准扶贫的效果。

其次，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基于精准扶贫战略布局，构建职业教育分类发展体系。对不同发展水平的职业院校进行分层管理，对办学效益、发展前景较好的职业院校，要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对扶贫效益比较明显的相关专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师资等力量的支持，对办学效益差、招生困难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对相关院校进行撤销或者转型，如将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独立设置的技术技能培训机构，专门负责贫困人员的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加大对各项资源的整合力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要积极延伸职业院校开展社会教育、服务与培训功能，采取多项措施来激励职业院校面向贫困人口开展短期或者长期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群体以及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各项技术、技能培训，提升这些群体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的机会，以增加其就业竞争力。

最后，要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应该注重对贫困人口职业技能的培养，使他们获得一技之长，提升贫困人口掌握技能的深度，增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专业设置上，要重点建设一批服务三农、特色鲜明的专业，加强职业院校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精准对接产业扶贫、区域扶贫工作；在教学模式方面，充分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工学一体等方面的优势，对农民工、残疾人等不同的社会群体探索更具有弹性的学制，提高他们学习产出的效率，为职业教育个人收益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创新主体：强化多方协同效应

在职业教育扶贫治理的过程中，各地区政府部门通过资金支援、项目帮扶等政策措施，加快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进程，政府在脱贫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与职业教育扶贫密切相关的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各市场主体在治理贫困的有效性、协调性、融通性等作用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需要创新市场主体，继续完善扶贫机制，加强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协调职业教育扶贫主体多元共治，强化多方协同效应。

首先，应该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职业教育扶贫体制机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涉及到众多的市场主体，各市场主体在利益诉求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如果体制机制不畅通，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就可能会存在“不作为”、“搭便车”、“上下共谋”等问题，从而影响扶贫工作协同效应的发挥。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出台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解决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制度性阻滞问题，确保各市场主体落实好职业教育扶贫的主体责任，鼓励引导企业、社会团体等市场主体汇聚成多元的社会扶贫主体，激发市场主体在教育扶贫领域内的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职业教育扶贫长效机制。

 其次，积极调动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市场主体的协同参与，多方联动出资出力，实现多元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可以引入PPP 模式，通过社会资本、私营机构与政府展开合作，两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各取所长[16]，提高贫困地区社会资源的供给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市场主体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在贫困地区建立职业教育协同扶贫基地、劳务培训中心等场所，积极开展定向式培养、订单式培养等模式，帮助贫困家庭和贫困个人早日实现脱贫。

最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建立扶贫信息交流合作平台。通过扶贫信息交流合作平台，整合政府部门、民营企业、社会团体等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各项信息资源，创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乡协同攻坚、区域间协同互动的扶贫攻坚共同体，运用合作式、参与式等治理模式，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整体效能，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早日实现脱贫目标，真正构筑起社会机构的广泛参与、多方主体协同推进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崔宏伟.现代学徒制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及进路探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8,34(06):104-107+110.

[2]秦中应.高职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优势与实施对策[J].职教论坛,2019(01):42-47.

[3]高玉峰.中国职业教育扶贫:从全覆盖迈向全面精准[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06):37-41.

[4]刘奉越.乡村振兴下职业教育与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耦合[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07):40-46.

[5]李鹏,朱成晨,朱德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理与实践反思[J].教育与经济,2017(06):76-82.

[6]钟国蓉. 海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7]雷桂娟,李小润.产业扶贫拓新径 推动“双创”促增收——一二九团“三加”模式助推贫困户走上致富路[J].兵团工运,2016(10):29.

[8]侯小雨,闫志利.近五年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与实践进展[J].职教通讯,2019(05):20-27.

[9]张建国.职教德育特色化的时代诉求与现实路径[J].职业教育(下旬刊),2019,18(03):3-14.

[10]王大江,孙雯雯,闫志利.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实践效能与推进措施[J].职业技术教育,2016,37(34):47-51.

[11]滕春燕,肖静.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要义、原则及发展指向[J].教育与职业,2017(23):36-43.

[12]吴海涛,丁士军.贫困动态性:理论与实证[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3]张军,张娟.职教集团推进精准扶贫的协同优势与实施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33):38-42.

[14]唐秋洁. 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中职数学教学实践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15]汤婷婷,谢德新.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回顾与前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33):25-31.

[16]周昊天.新形势下PPP模式的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6(24):17-19+50.